

开栏的话

“三十六计”总结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经验,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报特别策划推出“新三十六计”专栏,对应用“三十六计”的古今中外战例进行对比、解读、分析,从中发掘出更多价值,以对未来的军事斗争准备有所助益。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一计:『瞒天过海』

张 肇 社 建 国

“瞒天过海”出自《永乐大典·薛仁贵征辽事略》。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大军征高丽。正当唐军顾虑渡海作战困难时,大军总管张士贵禀报太宗,有位富豪老人求见,愿帮助大军过海。太宗前往老人家中,只见彩幕围着众多房子。老人恭请太宗进入一间,众人品尝佳肴美酒。不知多久,忽闻外面风声、波浪声,桌上杯盘也开始颤动。太宗命人拉开彩幕,只见一片茫茫大海。原来老人实为名将薛仁贵假扮,他担心太宗因顾虑大海阻隔放弃东征,便设计让他登船率大军渡海。因皇帝贵为“天子”,故该计被称为“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之计的精髓是通过伪装隐瞒真实作战意图,利用突然性达成作战目的。公元588年,隋文帝任贺若弼为行军总管,出兵攻灭陈国。贺若弼组织隋军频繁调防,每次调防都命隋军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一带集结。集结时隋军还大造声势,吸引陈国注意。陈国起先以为隋军准备渡江,动员全军抗敌,随后却发现隋军只是调防,便放松警惕,也不再部署防御。公元589年正月初一清晨,隋军渡江,陈国居然毫无觉察,隋军一举灭陈。此战虽发生在薛仁贵“瞒天过海”前,却是该计的典型案例。

2014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心收回克里米亚,也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在北约密切监视俄军动向的情况下,俄军进行了精心的筹划部署,大批调动的军队迷惑对方,还大张旗鼓地调拨大量军用列车开往乌克兰,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北约才发现这些军列都是空的。而此时摘掉徽标的俄军早已登陆克里米亚。混入乌国

防部的俄情报人员还在乌当局下达开火命令时,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迷惑乌军,帮助俄军控制整个半岛。

隋灭陈和俄控制克里米亚都运用了“瞒天过海”之计。贺若弼指挥隋军大举渡江前,通过频繁调防造势,吸引对手注意力,令陈军放松警惕。隋军选择正月初一这难以预料的时间,攻其不备一举渡江灭陈。俄军在北约的严密监控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多种手段误导对手,出其不意的完成登陆并控制了克里米亚。这两个战例的方法手段不同,但谋略运用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千方百计(包括使用公开行动)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对手的错觉和错觉,达成行动的突然性,削弱对手抵抗,提高作战效益。

美国著名学者邓尼根通过对历史上大量战例分析后得出结论:突然性既能抑制敌方战斗力发挥,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己方战斗力,可使战斗力提高1.7倍。此数据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其揭示的突然性“倍增”战斗力的规律毋庸置疑。隋军和俄军取胜的关键都是“瞒天过海”达成了行动的突然性。

任何战争准备都不可能避免地会暴露出一些征候,在高度透明的信息化战场上,要达成完全意义上的突然袭击几乎不可能。但只要能够精心计划,将敌方的临战反应压缩到最短时间,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攻其不备。秘密计谋,不能总是通过隐蔽行动去实现。如果把秘密计谋隐藏在公开行动中,反而更符合辩证法。因为越是怀着阴谋搞隐蔽,敌人越要查个水落石出;越是藏着掖着搞欺骗,对手越是时刻提防。相反,当“光明正大”地亮出底牌时,敌人反而不信你会那么“傻”。唯其不信,才正中我下怀。这就是“明骗”之术常常成功的奥妙。

“瞒天过海”谋略在不同时节,不同形势下表现各具特色,但其深处都带有常见无疑的“明骗”底色。运用此计的关键在于找准对手最常见、最常用的行为方式,将其作为公开施骗的“掩护”,才能达到令敌人熟视无睹、常见无疑的效果。结合古今中外“瞒天过海”战例的历史经验和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分析,未来战争运用“瞒天过海”谋略,可综合采取以下伪装欺骗措施:

一是散布“和平烟雾”迷惑对手。信息化时代,由于战场透明度提高,以“和平烟雾”抵消敌人高技术侦察,是隐蔽行动的必然要求。如由国家领导人或外交官员出面,在适当时机、场合宣布国家方针、政策和军事热点问题的“和平”愿望等,

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麻痹敌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萨达姆一边调兵遣将,一边通过外交和媒体宣布伊拉克绝不反对科威特使用武力、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科争端等欺骗信息。虽然美国卫星发现的战争征候越来越明显,但美国及其盟国领导人未给予应有重视,科威特军队也没进行战备,遭到突袭后,一天就全国沦陷。

二是实施“高压致意”麻痹对手。战争史上许多“瞒天过海”的成功战例,都是进攻一方在反复演习后“顺手牵羊”达成的。从心理学上看,大张旗鼓地军事行动,起初必会造成敌人高度紧张,但这种紧张心理随着行动的重复,就会不由自主地松懈,这就为达成突然性创造了条件。在长期和平环境下,借用例行演习、调防,完成兵力装备的集结,达成进攻突然性是“瞒天过海”的常见形式。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埃及军队就利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每年都要组织演习为掩护,频繁调动兵力,使以军放松了警惕,在其眼皮底下集结起了庞大兵力,瞒过了以军的侦察器材和美军事卫星。战争打响当天,埃军仍有部分军官休假,士兵在运河里游泳以制造假象,而后突然发起进攻,以伤亡208人的微弱代价一举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

三是通过“隐真示假”误导对手。现代战争出其不意固然困难,因为我们或许很难骗过对手的“眼睛”。但正如哲学上讲的,现象比本质更加丰富多彩一样,战争中的“示形”,远比对抗双方的实际企图更加奇妙莫测。信息化战争,单纯运用隐真谋略不能完全蒙蔽高技术侦察,而示假技术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军队装备的各种制式假目标具有外形逼真、批量生产、结构轻巧、运输方便、架设与拆收快速等优点;就地征集或利用废旧材料加工制作的假人、假工事、假兵器、假渡口等假目标也取材方便,经济实用。通过涂抹涂料,设置假热源和无线电发射器等手段,甚至能够有效迷惑敌人的红外侦察。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示假技术有效地欺骗了空中侦察,吸引了大量造价昂贵的精确制导武器,使美军空袭命中率与预想效果相去甚远。先进信息技术虽然能帮助人们看到“山那边的事情”,却不能保证人们及时看懂对手企图。如果技术得力,谋略得当,时机得体,多法并举广撒“战争迷雾”,则完全可以像俄军兵不血刃的控制克里米亚一样,创造信息化时代“瞒天过海”的奇迹。

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过,击中第三个鬼子的脑袋。

祝寿

南昌起义后,陈赓随起义军撤退,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辗转到达福建汀汀医院后,医生傅连璋告诉陈赓,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能截肢。

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璋告诉陈赓,一刀一刀剁掉烂肉,“那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璋:“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

手术做完后,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璋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璋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1961年,陈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栗 水)

传奇枪法

罗炳辉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百中,绝无失手。他常常听到子弹的呼啸声,就可分辨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以及射击的距离有多近多远。抗日战争中,罗炳辉的一颗子弹



目送

1934年9月,红六军团在甘溪镇战斗中失利,开始突围。党代表任弼时患上疟疾,高烧不退。

在一个狭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指挥部队。警卫连连长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说完,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就像出去散步

长征中,有一次,军委纵队的担架

大国雄心更加需要战略清醒

艾 纯 明

2017年是英国海军多灾多难的一年,经历了年初的“三叉戟”战略导弹发射,又迎来了年底的新航母漏水、主力驱逐舰集体“趴窝”,英伦三岛目前只有一艘4000吨级的23型护卫舰担任海上警戒。

而在一百年前的1917年,英国海军仅本土舰队就能出动150多艘舰艇作战,将德国公海舰队牢牢封死在港口里。同样是在这一年,英国开始改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暴怒”号,开启了海军航空兵作战的新纪元……百年时间差距,早已天壤之别。同昔日相比,今天的英国不但老了,还病了。

英国的病,归根于国力衰退,起因于战略迷失。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曾诞生过许多政治家、战略家,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人的战略基因似乎遗失了,留下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和教训。

教训之一,战略是全局的不是具体的。西方人形容战略曾有一句名言:战略研究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战术是研究看得见的东西。所谓看不见,很大程度上其实形容的是战略的宏观性、全局性,一旦拘泥于具体问题,必然导致战略头脑的缺失。2000年后,

英国首相走马灯般地换,大战略却几乎一成不变。除了追随美国,就是搅浑欧洲,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具体事务上打转转。今天英国外交圈的战略僵局,应归咎于长期保守造成的战略呆滞。

教训之二,战略是稳定的不是随意的。作为欧洲离岸国家,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既参与欧盟又不过度介入,既承担有限责任又不大包大揽,既紧跟美国又调和欧美矛盾,原本是英国的战略优势。然而在2017年,英国人决定“脱欧”。不仅要承担巨大的盟约代价,连多年来以欧洲集体安全为主导的防务格局也要重新调整。从英军的表现来看,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无论“脱欧”这一决定正确与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部分民意裹挟影响,在“不问头脑唯选票”的短期利益驱使下,仓促敲定国家重大战略,仅这一决策过程本身,就把英国国界的战略随意和短视暴露无遗。

教训之三,战略是务实的而不是务虚的。面对逐年下滑的经济压力,本应壮士断腕、开源节流的英国,依然在伊拉克、阿富汗保留驻军,全然不顾

战略投入的血本无归。结果是驻阿英军的圣诞礼物每人仅有1英镑,自嘲“混得不如隔壁美军养家的猫”。即便如此,英国国防大臣还曾口出狂言,宣称英国计划2018年派遣航母“巡航”南海,以增强英国的海上地位。殊不知,中国每年新入列的军舰数量就接近英国海军一半的舰队实力,如今的英国既没有干涉南海事务的资格,更没有插手南海的底气。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鉴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2018年,我们行进在紧随习总书记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越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越要从其他国家的失误中汲取教训,胸怀远见,保持战略清醒,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历史上有过哪些体制调整?

徐 平



左图为上世纪50年代初公安部队的帽徽、胸章、臂章。右图为建国初期的公安部队,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公安”臂章。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经过多次体制调整,名称变化了十余次。

五大军种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日,军委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转中央军委138号代电令:“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及所辖第1师、第2师即日成立。”这个公安中央纵队实际上就是武警部队的前身,当时隶属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军委公安部,主要负责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及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并配合部队完成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

1949年12月第一届全国公安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力量的方案》,决定建立人民公安部队,以加强各地的社会治安工作。1950年1月至5月,全国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195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提出:“公安部队数量不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在原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机关的基础上,抽调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于11月8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9月,公安部队全称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公安部队”。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命令,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与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并列的解放军五大军种之一。

几度更名

1957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

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撤销,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在一些军区司令部内设立警备部(或称公安部队)或警备处,作为领导内卫、边防工作的业务部门。原公安所属部队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1958年12月,总参警备部所属公安部队和公安部所属武装警察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公安部领导。

1961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部所属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新划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在解放军序列里,仍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63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公安部命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66年7月,再度撤销公安部队,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划归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武装部领导管理。

1974年6月,随着边防、武装、看守、消防民警陆续由职业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公安系统中的这些警种和划归到公安系统中的部分解放军内卫部队,统改称为“人民武装警察”。

八个警种

1982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1983年1月25日,国务院任命了武警部队领导人,武警部队机关在北京开始办公。4月5日,武警部队正式宣布成立。此时,武警部队的领导体制简称为“一统二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各地公安机关分级管理、指挥,但以“二分”为主。

1985年1月1日,原属基建工程兵的水电(成立于1966年8月)、交通(成立于1966年8月)、黄金(成立于1979

年3月)部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设立水电、交通、黄金指挥部。

1985年8月,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改善和调整边防体制的通知》和《关于改进和加强消防部队领导管理的几项规定》的通知,分别将全国边防武装警察和消防武装警察重归各级公安部门领导。

1988年2月4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武装森林警察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在林业部设立森林警察办公室。

1995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再次对武警部队领导管理体制作了重大调整,将原来“一统二分”的体制改为“两统一分”,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与各级公安机关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这一调整,使中央军委进一步加强对武警部队的领导。

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解放军陆军部队的14个乙种步兵师转隶武警部队序列,作为武警内卫部队的机动师。

1999年初,又将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隶属于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水电、黄金、交通、森林部队,明确交由武警部队领导。

2018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不再列国务院序列。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大创新举措,是加强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